

田野调查与相关艾滋病问题研究现状的回顾

张宁, 赵利生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自艾滋病在我国流行开来,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直面这一现实社会问题, 深入田野运用专业知识开展不同形式的田野调查研究。本文拟对社会组织参与防治艾滋病、艾滋病感染者的主体性、适应性以及社会支持系统、艾滋病高危群体亚文化等三个方面的新近田野调查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以期达到梳理这些调查研究成果, 并讨论后续艾滋病田野调查研究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田野调查; 防治; 艾滋病; 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C91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1)01-0077-07

在第23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 回顾社会科学界近十年(2000年-2010年)来对艾滋病问题的研究, 对及时系统总结认识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意义和讨论艾滋病问题的后续调查研究方向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社会科学界全面深入介入艾滋病问题的研究是以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为标志的, 其中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以其特色的研究方法对我国不同艾滋病流行区域的流行问题进行本学科的解读研究, 许多研究成果对当地防控艾滋病流行以及高危人群、高危行为干预提供了成功的智力支持。社会科学界介入艾滋病问题研究得益于有机会参与到一些双边的、国际的防控艾滋病项目中, 还有国家和相关部门、省份对防艾工作的重视, 积极邀请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到防艾工作中, 这样有利于扩大防艾的对策视野, 更好的调动各学科知识参与防艾。例如: 中英性病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中国—默沙东

艾滋病合作项目、中美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项目等等。这些防艾项目给我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展示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平台, 庄孔韶、景军、靳薇、潘绥铭、罗红光、翁乃群、张海洋、崔延虎、兰林友、向德平、侯远高、黄盈盈、富晓星、徐晓军等人及其研究团队在项目经费的支持下, 对我国艾滋病高发区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高危人群以及领导层开发进行了调查, 并提交了策略调研报告。相关调研报告已经部分公开发表, 为人们认识学科的应用性价值和推动防艾实务工作均带来了积极影响, 也促使了更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关注并参与防艾的调查与研究。一些文章^①已从不同视角对部分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与述评, 为学界了解掌握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艾滋病问题的不懈探索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疾病问题, 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艾滋病相关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进

收稿日期: 2010-11-02

作者简介:张宁(1982—), 男, 江苏溧阳人,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民族学研究院民族社会学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

赵利生(1966—), 男, 甘肃正宁人, 法学博士,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民族学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

^① 包括: 庄孔韶、兰林友:《我国人类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147-148页;高一飞:《艾滋病预防研究中的医学人类学述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56-62页;郇建立:《中国艾滋病的社会科学研究20年》,《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第83-91页;李文星、郑莉、张建新:《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社会学建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68-71页;谢新华、王顺冬:《我国少数民族艾滋病研究回顾》,《民族论坛》,2007年第9期,第7-9页;张宁:《社会科学研究与艾滋病传播:以中国大陆学界为中心》,《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第77-82页;张晓虎:《国内艾滋病问题的研究现状评析》,《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年第4期,第26-27页,第35页;沈晖:《吸毒人群艾滋病防治:理论视角述评》,《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52-57页。

一步为国家防艾实践服务中,走进艾滋病—“他者”的世界中去,参与观察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和高风险人群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在掌握第一手资料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只有这样才能在防艾实践中突出学科的话语权和应用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运用人类学质性研究的方法开展深入的、全面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具有深度质性研究的基础,才能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符合防治目标区域或群体实际的,包括社会文化和生物医学两方面的有效综合防治干预措施。”^{[1](P67)} 本文在搜集、整理、研读相关新近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为视角,对社会组织(NGO)参与防控艾滋病;艾滋病感染者的主体性、适应性及社会支持系统;艾滋病高危群体亚文化等三个方面的田野调查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并讨论后续艾滋病相关问题调查的可能方向。

一、社会组织(NGO)参与防治艾滋病的调查研究

社会组织(NGO)在参与防控艾滋病中有其独特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且各国均鼓励支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2004年,中国成立了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工作机制。又先后制定了艾滋病防治中长期规划和两个五年行动计划,2006年又出台了《艾滋病防治条例》,皆提倡鼓励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此外我国参与的一些国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对社会组织(NGO)参与防治艾滋病提供专门经费资助,有利于促进本土社会组织防艾积极性和相关能力提高。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学理论认为,当国家体系中的政府不能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又囿于利润动机不愿提供公共物品时,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体制,可以弥补原资源配置体制的不足”。^{[2](P76)} “在中国的艾滋病防治领域,大量草根 NGO 是通过国际项目在本土的运作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中国的 NGO 在学习与熟悉不同的国际 NGO 的概念与

标准时,也在推动着中国 NGO 的本土化发展,并在与国际 NGO 分享知识、经验和看法的过程中,发挥出自己的创造力。”^{[3](P51)} 在参与防艾的社会组织中包括感染者/患者自助/互助组织、男男同性恋组织、女性性服务者组织等涉及高风险人群和感染者群体关怀组织,这些组织一般由圈内的核心关键人物发起成立,形成一个辐射一定区域相同人群的组织,主要对圈内人群进行关怀与干预工作。

中央民族大学侯远高教授和张海洋教授合作对弱势群体调研时发现,毒品和艾滋病给彝族乡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随即展开对该地区艾滋病问题的田野调查和研究,研究的最重要共识就是要建立一个本土社会组织(NGO)充分调动民族文化资源发挥自助优势开展防艾禁毒关怀等一系列行动。^{[4](P3)} 在众多本土学者和社会名人的帮助下,于2005年成立了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① 发展中心在毒品、艾滋病预防和妇女儿童关怀方面做出了大量且富有成效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彝族地区要积极利用民族资源、优势,发展经济,努力改变现状,政府和民间携手共进”。^{[6](P207)} 兰林友教授与四川 P 市基层民间组织(向日葵小组)合作对 T 社区女性性服务者群体进行了全方位观察与研究,^② 认为“通过对小姐群体性实践的行为数据品质的比较研究,验证小姐所说、实际所做的性行为,从而发现对于公共卫生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文化行为的细节,为艾滋病行为干预提供地方性洞见。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就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而言,尽管大多数小姐都知道,但对艾滋病的危害程度和与自身的关联,基本上缺少深刻的认识,更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这就是说,并无实质性的高危行为改变”。^{[7](P83)} 向德平教授与程玲博士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调查了艾滋病感染者自助小组的发展状况,总结了自助小组的作用,分析自助小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认为“提高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既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更需要艾滋病感染者自身的努力。自助小组是艾滋病感染者消除社会歧视、提升个人能力、获取社会资源的重要平台”。^{[8](P5)} 程玲博士通过对湖北省七个艾滋病患者互助小

① 梁艳菊:凉山,一个本土化的 NGO;记侯远高和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J].中国民族,2009,(1).李光勇:本土非政府组织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的构建—以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为例[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2).

② 研究成果包括:兰林友:《小姐群体特征与艾滋病防治:趋势挑战及对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兰林友:《脏的文化建构》,《读书》,2010年第8期;兰林友:《中国艾滋病防治的人类学研究:安全套使用意愿的人群分类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4期。

组相关增权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认为“艾滋病患者互助小组的发展是小组成员需求逐步得到满足的一个过程,也可以说,艾滋病患者互助小组是有益于艾滋病患者个人成长的。艾滋病患者互助小组以结构为要素,通过小组活动中成员间的互动,帮助艾滋病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和发展社会潜能,促成艾滋病患者的改善和艾滋病患者互助组织的发展”。^{[9](P170)}梁德红、李坚通过对沈阳地区一个主要面向同性恋人群进行健康服务的小组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论证民间非营利组织在同性恋群体中进行健康教育的有益作用,并结合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等相关理论,提出可行性建议”。^{[10](P271)}李丹丹通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一个男男同性恋工作组——G工作组的调查,提出“获取艾滋病防治领域 NGO 社会资本的思路包括建立信任关系网络是构建组织社会资本的基础;有效开发和管理志愿者的社会资本是构建组织社会资本的重要支撑;调整管理体制和加强法制建设是构建组织社会资本的制度保障;积极培育公共精神是构建组织社会资本的文化基础”。^①随着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国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国际 NGO 参与中国防艾工作,他们面临着什么问题?项目地区又能从中学到什么或有什么收益的地方?这些问题引起了学人们的关注。戴光全和陈欣通过亲身经历,参与观察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VSO)与云南省 FG 县艾滋病合作项目,从微观的行动层面分析技能援助型 NGO 在中国是如何具体工作,又如何与地方政府发生联系,认为“基于志愿者与社区间跨文化理解的局限,对国际 NGO 和志愿者来说,对社区的认同比知识更重要”。^{[11](P100)}罗娟通过在凉山州对国际和国内 NGO 的田野调查,认为“NGO 在凉山的兴起既非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也非是当地社会‘市民化’的产物,而是国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诉求有效的社会治理(governance)与全球化、民主参与政

治理理念扩张渗透之间的一种合谋”。^②

纵观以上研究,对社会组织(NGO)研究既有不同类型组织的个案研究也有国际国内组织的比较研究,研究视角的多样证明社会组织(NGO)日益在防艾中作用的体现。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艾滋病工作机制建立,表明防艾不仅是卫生、疾控部门的事,更重要的是要全社会每个成员都要行动起来。正如有学人指出“在当前中国社会面临重组的现实背景下,寻求‘艾滋政治’的理性思路和多中心治理成为艾滋病与社会问题研究的必然路径。”^{[12](P42)}

二、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的主体性、适应性及社会支持系统的调查研究

我国宣布对艾滋病感染者及患者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以来,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社会支持研究近年来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学人们频频深入田野与艾滋病感染者/患者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亲身感受观察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生存的环境和面对的问题,这对更加有效的帮助感染者/患者群体和相关关怀服务提供了针对性较强的对策建议。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感染者/患者的主体性、适应性方面和感染者/患者社会支持系统建构方面。

徐晓军博士在其新著^③中以湖北东部地区艾滋病人所在村庄社会关系为切入点,参与观察艾滋病人身上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变化,真实的反映出乡村艾滋病人的生存状况。在其一系列论文^④中也集中探讨围绕乡村艾滋病人在特定的场域中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其论文中有不少观点对艾滋病关怀工作亦有诸多启发。由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和湖北省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办资助的《社会学视角的艾滋病研究》丛书,主要针对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支持、社会处境、社会性别、社会排斥等内容^⑤展开系统研究,是最近研究艾滋病患者生存、适应方面较为系统的一

① 李丹丹. 艾滋病防治领域 NGO 的社会资本状况研究——以 G 工作组为例[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23.

② 罗娟. 凉山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兼谈 NGO 本土化问题[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59.

③ 参见徐晓军:《断裂重构与新生:鄂东艾滋病人的村庄社会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

④ 参见徐晓军、张必春:《从想象到现实:艾滋病人社会关系张力与断裂的逻辑》,《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69-73页,第7页。徐晓军:《内核,外围: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动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64-95页。徐晓军、祝丽花:《“弱组织”状态下乡村集体行动的产生逻辑——以鄂东某村艾滋病人的集体行动为例》,《青年研究》,2008年第10期,第43-49页。

⑤ 参见向德平等著:《需求与回应: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支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向德平等著:《困境与出路: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处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张翠娥:《差异与平等: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性别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陈琦:《边缘与回归: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排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

套参考资料。孙咏莉博士的论文^①通过对新疆伊宁市萨阿代特社区、针具交换站、伊宁市人民医院和戒毒所等吸毒人员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人多个生活场景的参与观察以及对这一群体的深度访谈,试图展现出这一群体特有文化的真实面貌。余晓燕博士通过在毗邻中缅边境线云南省L县5个月的参与观察,发现当地乡村医生与艾滋病感染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更好的处理当下防艾中紧张的医患关系。文章得出“来自田野的事实证明,围绕着防疫实践的医患交往在信任机制的组织下,不仅柔和了官方防疫体制与对象间的文化张力,还通过策略而技巧的实践过程增强了对阳性人群的控制能力,并反过来强化了医患间的信任纽带”。^{[13](P127)}建构有利于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的社会环境,最大限度消除歧视是社会支持系统中最为重要一环。行红芳在我国中西部S县TZ乡X村对因卖血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患者的实地调查,通过婚恋、教育、人际关系三个考察变量,探讨熟人社会的个体及地区的污名及污名控制策略。得出“由于艾滋病患者在特定地域的集中,空间成为影响污名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地域污名化;由于熟人社会的特征,病人难以在社区内进行污名控制,隐瞒策略往往无法起作用;熟人社会和污名地域化导致地域的污名控制策略——地域概化和地域隐瞒出现”。^{[14](P41)}张慧在北京地坛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湖北省巴东县茶店子乡、湖北省随州市均川镇富家棚、湖北省沛水县、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川庄等六个田野点对14个感染者/患者病痛叙述记录、三个媒体公开个案和7个他人介绍个案的研究达到对中国产生艾滋病污名的特殊的社会文化情景和意义的描述和理解。文章指出“事实上,引发艾滋病歧视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是由知识的缺乏所引起的(当然不是说知识的宣传不重要),而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艾滋病污名”。^②

上述研究,总的一个中心都是围绕艾滋病感

染者/患者与其生存社会环境之间博弈的个案展现。个案中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感染者/患者不仅要面对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还得面对外界舆论、歧视、医患等等一系列社会压力,感染者/患者的主体性和适应性表现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宽容度。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9月22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艾滋病讨论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在同艾滋病病人接触时感受最深的是,他们不仅要忍受疾病的痛苦折磨,还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无知和歧视有时比疾病本身更可怕。”“我非常赞赏乌干达所推崇的那句话:‘我们是同艾滋病作斗争,而不是同艾滋病人作斗争’。”^③这说明政府高层对艾滋病歧视的认识是清晰的,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的社会支持环境得到逐步改善是政府、社会、个人三方面共同努力的目标。有学者提出社会工作、社区和社会网络的视角^④在帮助和关怀艾滋病患者中的巨大潜力,这与全社会参与防艾目标是一致的,也是构建社会支持环境的有效方法之一,应该值得大家注意。

三、艾滋病高风险群体亚文化的调查研究

艾滋病高风险群体有其极深的文化及符号象征隐喻,与其社会阶层、生活环境及所属文化人群紧密相连。处于社会结构边缘且阶层地位、经济地位较低的亚文化人群易受到艾滋病伤害,成为艾滋病高风险群体。易感性和脆弱性是这一亚文化人群具备的显著特征,亚文化人群在艾滋病知识、信息结构和对待艾滋病的态度、观念以及行为表现方面显示出与主流文化人群很大的差别。有学者对亚文化人群为什么成为艾滋病高风险群体潜在人群原因分析到“采用非正常手段会加大亚文化人群的行为风险,这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还涉及其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社会机会结构安排不合理必然增加亚文化人群夺取目标的风险性,从而使边缘亚文化人群为此付出更大的健康代

① 孙咏莉. 贫困、道德与焦虑:新疆萨阿代特社区中的艾滋病[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② 张慧. 污名与歧视:以中国的艾滋病为例[D]. 北京: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③ 参见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艾滋病讨论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0年9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9/23/c_12597446.htm

④ 参见刘斌志:《社会工作视域下艾滋患者的复原力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25-33页;向德平、李光勇:《社会工作:艾滋病患者救助实践的新路径》,《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122-125页。林卡、赵怀娟:《行为主义视角:一个对于艾滋病防范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维度》,《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第188-193页。向德平、吴丹:《艾滋病患者社会支持与生存质量的比较研究——基于对有偿供血人群、MSM人群及女性工作者的调查》,2010年第4期,第194-200页。刘畅. 共生视野下的温馨家园——湖北随州两镇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支持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方鹏骞、詹发先主编:《社区发展与艾滋病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07年8月。

价”。^{[15](P4)}对艾滋病高风险群体亚文化研究,社会科学界主要以男男同性恋人群、有商业性行为的女性人群、静脉吸毒人群、有偿血液交易人群为主要研究对象,此外还有对一些流动农民工人群的研究。

同性恋人群古已有之,其性取向以同性为主。“关于同性恋成因的认识,一种是先天性论点,一种是后天性论点。大多数的人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心理上的变态,是由于后天的一些原因造成的”。^{[16](P154)}同性恋中男男同性恋(MSM)人群是易感艾滋病的高风险群体,我国男男同性恋人群基数数据估算有500万—1000万男性为同性恋者。^{[16](P38)}对这既庞大又神秘的人群,社会科学界能像医学界那样产出丰富的研究成果吗?答案是肯定的。富晓星和吴振以“主位”视角同性恋草根组织志愿者身份深入沈阳市男同性恋群体的生活中参与观察,^{[17](P38)}探讨了同性恋群体的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实践如何在城市空间“点儿”中得以组织、表达和理解。并发现通过与同性恋群体自身特点的互相作用,城市空间“点儿”为同性恋的行为、情感、身份的流动构建了能动平台。王凯和沈海梅通过对西方人类学中同性恋的研究梳理,^[18]反思人类学对同性恋研究“主位”、“客位”视角尺度的把握,研究中的伦理道德把握等问题。对男男同性恋人群研究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以合适的身份进入这一人群中来自观察,观察得出的结论真实性程度有多大,研究者又如何克服自身潜意识的想法以及怎样处理推断被访谈人谈话内容等,都是在研究男男同性恋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的。王曙光通过对420名男男性关系者的定量调查研究,提出“人类行为取向、表达、易感并非一般地结构在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制度的环境维度中,而是存在着人群自身‘实践导向选择’的更生动的整合过程,而远非建构理论“社会脚本”对于行为的简单制定”。^{[19](P129)}

对有商业性行为的女性人群研究,以“作为组织的文化特征”为视角为近几年较为引人关注

的研究动向。庄孔韶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通过对不同区域的有商业性行为女性人群一系列研究^①,讨论将“小姐”群体流动方式看作是“做为文化的组织”加以考察,从中发现“小姐”群体背后存在的地缘、业缘、亲缘等关系,有利于向卫生疾控等相关部门建议提供更加有效地干预措施,也找到了学科应用性价值的契合点。

吸毒人群是边缘人群中的边缘,这类人群的高风险性不言而喻,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景军教授^[20]探讨朋友圈对中国青少年吸毒经历的影响并阐述这种特殊朋友圈子的形成教育制度的关联。通过6例初次接触毒品吸毒者的访谈和4例复吸毒品吸毒者的访谈,论证以亲密性为基础的朋友圈子在中国青少年首次吸毒和戒毒重新吸毒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桥梁作用。该文特别提到的关键变量——教育制度对越轨青少年的重要影响作用。韩丹博士专著及一系列论文^②对南京市71位吸毒者深入访谈,探讨吸毒人群亚文化对吸毒行为的重要影响。王晓丽研究员在乌鲁木齐市对贩毒人群和吸毒人群定量调查的基础上,认为“乌鲁木齐(包括新疆)不是制毒的基地,而是‘金新月’毒贩选定贩运毒品的重要通道;不是贩毒、吸毒、艾滋病,没有民族界限;贩毒—吸毒与艾滋病是同一链条上的两害,是当地艾滋病疫情的主要成因”。^[21]

有偿血液交易人群在我国艾滋病高风险群体中,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偿血液交易在我国中部地区流行开后,使得艾滋病毒通过血液传播,这为本就贫困而卖血的农民雪上加霜。刘畅^[22]以湖北省S市两镇为案例,以惯习和场域为研究工具,分析艾滋病患者最初进入卖血场域的过程和惯习缘由,以及非法血站在艾滋病传播中的作用。邵京^[23]博士通过对河南农村有偿血液交易而感染艾滋病毒的个案调查,探讨中国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深远社会文化变更。

① 庄孔韶.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新态势和人类学理论原则之运用.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58-65页;庄孔韶,赵世玲. 性服务者流动的跨国比较研究与防病干预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22-33页;李飞,庄孔韶. “作为文化的组织”的人类学研究实践——中国三个地区女性性服务者群体特征之比较及艾滋病/性病预防干预建议.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53-60页;刘谦,吴庆戎. 从组织文化特征出发的低交易价格产业艾滋病防治策略——以Lz市“板板茶”为例. 中国艾滋病性病,2010年第1期,第59-62页;刘谦. 面对艾滋风险的自律与文化——对低交易价格商业性行为的人类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6月;郭丽香. “小姐们”的组织与流动——对四川省Y县性工作者的人类学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刘颖. 女性性服务者流动性的人类学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3月。

② 韩丹. 吸毒人群调查.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韩丹.《流行文化视野中的吸食新型毒品行为研究——以南京市为例》,《青年研究》,2008年第3期,第43-49页;韩丹. 城市吸毒人群吸毒行为成因的个案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12期,第68-72页,第79页。

流动农民工人群被列入高风险群体,缘于自身所处的弱势阶层地位。这一群体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对各种诱惑充满兴趣。又因离开熟人社会圈,社会控制力呈减弱趋势,孤独、寂寞、好奇等因素左右他们每天的生活,这一人群中极易发生高风险行为。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人群和社会现象,一些探讨已经展开。富晓星^[24]通过对北京两个建筑工地(人民大学、西四环某新建小区)四川、河南、湖北籍的建筑业农民工的调查,分析了他们的组织和流动特征及易感因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艾滋病干预措施。高一飞^①在云南西部地区高速公路修建工地和龙村、芒村、马村三个村落的调查中,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多种研究方法关注筑路工地人群、性服务者和工地周边社区,在其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中分析各个群体所面临的艾滋病风险,全面展现公路沿途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的关系。

四、讨论

上述是我们对社会组织参与防治艾滋病、艾滋病感染者的主体性、适应性以及社会支持系统、艾滋病高危群体亚文化等三个方面的新近田野调查研究成果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对相关艾滋病问题时执着的探索精神和深入田野的勇气和学术责任感。一些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及时总结提炼理论,通过理论再指导实务工作,形成了良性循环。比如庄孔韶教授以“作为文化的组织”理论的运用,对观察研究商业性性行为人群、流动农民工人群等高风险群体的组织文化特征有很好的启示作用。王曙光对男男性关系者考察研究后认为人群的“实践导向选择”变量值得注意,仅仅以社会建构理论范式去简单考察不足以接近问题的真实性。在应用研究的基础上,学人们已经开始对中层理论思考,这有利于增加社会科学介入艾滋病研究的话语权,彰显学科的价值。通过以上研究现状并结合我国艾滋病问题的现实,我们试讨论后续研究的可能方向如下。

1. 增强研究成果的转化运用意识

有学者指出“总的来说,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对艾滋病问题的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明显不足”。^{[25] (P35)}近年社会科学界对艾滋病问

题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有所提高,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对指导防艾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学人们整体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意识还有待提高,比如主动与卫生疾控等部门的互动联系,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发表或提供相关实务机构等,这样就使得外界不了解甚至不知道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防艾研究方面做了些什么,学科的价值和话语权没能最大限度的体现出来。

2. 加强研究视角的多学科综合

对相关艾滋病问题研究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有其比较特殊的优势,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可以多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视角。比如流行病学,美国医学人类学家特罗斯特指出“流行病学与医学人类学均为寻求行为模式和疾病模式的科学分支,两者的核心都是人文主义。流行病学倾向于统计和定量,人类学则重视文本和定性,但是本书将使二者携手并肩。笔者理想中的学科交叉和交流对话得以启动,而且得到许多人类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的认同,因为他们和本人志趣相投,十分看中这种志同道合的合作”。^{[26] (P4)}王瑜博士^②在海南A县6个乡镇和B县2个镇对农村黎族和汉族青年流行病学的比较研究,探讨社会性别、流动经历、社会环境(包括社区、家庭、同伴)等因素与艾滋病相关知识和性行为的关系,提供在多民族地区设计实施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干预教育的依据。此项研究结合了流行病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调查研究结果既反映卫生统计的数据意义又对黎族、汉族青年的社会流动进行了文化解释,研究结论真实信服。

3. 组织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可能性

从社会科学角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角度能否像医学流调那样组织大规模的相关艾滋病问题的调查呢?学界已经对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罗红光主持的“公共服务社会化研究——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人类学分析”课题;庄孔韶对不同区域“小姐”组织的研究等。艾滋病问题的复杂性对文化人类学学科提出了挑战,但机遇与挑战并存。这是研究对象特殊性所决定的,大范围长时间共时性研究对高风险人群非常有针对性,可以全面详尽的了解掌握某一高风险人群

① 高一飞. 滇西某高速公路建设工地沿线的艾滋病风险与人口流动[D]. 广州: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② 王瑜. 海南省黎、汉族青年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及性行为:流动经历、社会性别和社区环境的影响[D]. 北京: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

流动和组织特征以及所处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有利于接近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和可验证性。

4. 关注宗教组织防治艾滋病作用研究

在社会组织参与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对宗教组织关注度不够,宗教组织参与防艾研究还不多见。^①我国艾滋病流行的大部分区域多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些民族地区又都全民信教,宗教力量在该地区防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社会科学界的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 [1]翁乃群.重新认识质性研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以人类学应用研究为例[J].民族研究,2007,(6).
- [2]夏国美.论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变革[J].社会科学,2005,(11).
- [3]夏国美.中国NGO的当代跨越[J].社会科学,2010,(3).
- [4]侯远高,丁娥主编.发展的代价: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毒品伤害与艾滋病问题调研[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 [5]曲比阿果,陈雄飞.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凉山彝区出现的传染疾病及预防对策[J].贵州民族研究,2007,(6).
- [6]兰林友.性行为数据品质与艾滋病行为干预:P市T社区小姐群体性实践的个案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 [7]向德平,程玲.自助小组的建立、运行及作用:以艾滋病感染者自助小组为例[J].社会工作学术版,2007,(1).
- [8]程玲.互助与增权:艾滋病患者自助小组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9]梁德红,李坚.民间非营利组织在同性恋群体中健康干预初探—对沈阳市方舟健康干预志愿小组成长的思考[J].中国艾滋病性病,2006,(3).
- [10]戴光全,陈欣.国际NGO在中国:艾滋病合作项目个案的社会人类学观察[J].社会科学家,2009,(9).
- [11]陈潭,武玲婷.艾滋政治、社会重组与公共治理[J].学习论坛,2008,(7).
- [12]余晓燕.HIV/AIDS防治中的医患交往艺术:一个景颇村寨中的信任表达[J].开放时代,2010,(3).
- [13]行红芳.熟人社会的污名与污名控制策略——以艾滋病为例[J].青年研究,2007,(2).
- [14]张胜康,王曙光,邹勤.不同文化人群艾滋病问题的社会学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 [15]张晓燕,师伟.艾滋病特定高危人群的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 [16]富晓星,吴振.男同性恋群体的城市空间分布及文化生产:以沈阳为例[J].工程研究,2010,(1).
- [17]王凯,沈海梅.西方人类学领域中的同性恋研究[J].中国性科学,2010,(2).
- [18]王曙光.艾滋病亚文化易感挑战社会建构理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8,(4).
- [19]景军.中国青少年吸毒经历分析[J].青年研究,2009,(6).
- [20]王晓丽等.寄生在同一个链条上的两害——乌鲁木齐市贩毒、吸毒人群与艾滋病人群的相关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08,(4).
- [21]刘畅.进入卖血场:艾滋病的惯习与场域[J].探索与争鸣,2008,(12).
- [22]邵京.记录与思考:农村有偿献血与HIV感染[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 [23]富晓星.建筑业农民工群体艾滋病预防干预策略的人类学观察——以北京市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 [24]张晓虎.国内艾滋病问题的研究现状评析[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4).
- [25][美]特罗斯特.流行病与文化[M].刘新建,刘新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The Field Study and Re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Researches of Issues Relevant to AIDS

ZHANG Ning, ZHAO Li - sheng

(Research Center of Northwest China Ethnic Peopl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Gansu,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prevalence of AID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have been conducting a variety of field studies aiming at this practical social problem. This article has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recent research findings concern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to AIDS prevention, the subjectivity of AIDS infection, adaptability and social support system, and the subculture of the high-risk AIDS group. It also discusses the possible approaches to the follow-up field studies of AIDS.

Key words: field study; prevention; AIDS; soci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责任编辑:燕妮]

^① 关于宗教组织参与防治艾滋病的探讨已经兴起,《中国民族报》曾刊登过一些文章讨论相关问题。包括:《伊犁州直宗教界参与社会服务的方法途径》,2010年9月14日第6版;《西双版纳有个“佛光之家”》,2009年12月1日第5版;《宗教对艾滋病防治的关注》,2009年12月1日第6版;《重建有“神”的社区》,2007年3月23日第6版。